



东西方之恋

刘晓文 李懿译

〔美〕杰拉尔德·格林 著

丹波建司：

1941年5月

东京北部的都岛区，一辆公共汽车停下，正等着一群小学生穿过马路。

这些小家伙新剃了头，蓝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，穿着黄铜钮扣的制服，头戴蓝黑色的制服帽。看着他们，我不禁笑了。他们使我回忆起了我的童年时代，此刻，我既悲伤又欢欣。难以捉摸而又令人伤感的逝去了的青春岁月。假如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启示，假如我们能沉浸于美好的回忆中，那么，过去的时光是令人愉悦的。

学生们走进一所破旧的小学校。学校里草地干枯，玻璃窗破敝不堪。迎面是一座黄褐色的无楞瓦的大楼。

在大楼出口外，用砾石铺成的广场上，矗立着一尊二宫金次郎的石塑像。我低下头表示敬意。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日本许多学校都建立了这尊塑像。金次郎是一个传奇式的青年人，他总是被描绘成一个背负木柴，手中拿书的形象。他出身贫困家庭，不得不去做艰苦的工作，但这遏止不住他求学的渴望，他一生中获得了许多东西，这尊塑像是教育与勤奋工作相结合的象征纪念。

我现在28岁，感到背负着沉重的负担，在教室里一学就是好多个小时，那是怎样艰苦的日日夜夜，当然，也得到了酬报。就在仅仅几小时之前，在东京帝国大学我的保证人的办公室里，我得到了奖励我在美国已取得学位的奖学金。

足立教授表扬了我。“你应受赏、建司，”他说，“你很有发展前途。你是否愿意再回到美国？”

我告诉他我愿意。我在俄勒冈大学度过最后两年的大学生生活，还获得了政府级的奖学金。现在，由于我们的皇帝、尊贵的陛下裕仁的慷慨相助和仁慈，我将去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一旦获得哲学学位，我将去教育部，在那里当足立教授的助手做些临时性的工作。

足立教授被他的学生亲切地称呼为“最后的儒家门徒”，在全日本，他是社会学家的权威人士。孔子的教义，重视教育以及合乎道德的行为举止、端正的思想、正派的生活作风，是他哲学的实质。我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时，他对我是一个鼓舞。

“好，再见，建司，”他说，“你会喜欢洛杉矶的。它释放出一种魔力般的橘花香和汽油味。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能和这个城市媲美。”

我们笑了，我向他鞠躬以表示我对一个富于辨别力的、一个说话富于哲理的老师的敬意。

坐在喧闹、嘈杂的通往郊区的公共汽车上，我考虑着如何努力才能使我的父母、老师以及皇帝满意，作为一个学者，他希望有一天能为他的政权服务。

汽车继续行驶，最后我在武藏训练营下车，这是距离东京中心以北15英里的军营。一个平坦、灰尘蒙蒙的地方，但

与军营接邻的那片地，却令人难以置信地种了许多东西，农民在这里种了稻子、蔬菜和水果。军营两边装有带倒刺的铁丝网。在主门的上方是一幅粗糙的人像图，此人被称为——武藏，是训练军营将士的人，在日本历史上是最大的杀戮者，这个16世纪封建时代的武士还是一个哲学家、艺术家和诗人。武藏令人难以置信地保留着日本人的想像力。

卫兵查看他的花名册，发现了我的名字，向我鞠躬（尽管我身着平民衣服）放我进去了。很明显，他获悉我是山西残暴严厉的军官丹波真男的弟弟。

真男比我大三岁。自1937年和中国打仗以来，他就开始了军人生涯。虽然他仅仅只是一个低级军官，但是他的领导才能，他的勇猛以及战略天才表明了他是个特殊的人。他的保护人兼未来的岳父佐太上校告诉我，真男在这里前途无量。

当我穿过坚硬的操场时，我惊奇地看到，新兵们光着头，在异常炎热的5月的太阳下烤晒着，围着场地一圈一圈的跑，另一部分人正在历经严酷的课程——爬绳索、匍匐爬过带刺的铁丝网，接着是跨越障碍物。军官大声命令，带着恶骂和人身攻击欺辱新兵，笞杖抽在他们的脖子和背上。做个日本军人真不容易，我自觉有愧，作为一个学者，到目前为止，我的位置使我豁免于这些灾难。

有些天我哥哥真男起得很早，这大多是违背他的意愿的，他被取消在中国监督新兵训练的职责。事实上，反对中国人的战争并不顺利，尽管报纸、广播声称日本军长胜不败。众所周知，在山西省南部打仗的大部分军队已实际上失败。由像我哥哥那样的猛将率领的部队，本打算跨过黄河，但许

多中国人都悄悄溜进山里。这时，一个新的指挥军官被派到山西。他推出“三光政策”——“烧光、抢光、杀光”，以对付中国人。

在被烈日烤得发焦的足球场地上，一群年青人站着等待投入一场战斗。在这些人组成的大型空方阵内，有六对竞赛者，他们头戴芦苇盔帽，身穿防护衣，手持8英尺长的竹棍，冲杀、回避、互相厮拼。如果我还是个小男孩，我会喜欢玩这种游戏的，但我知道，拿着富有韧性的硬竹棍相互厮打是不会舒服的——即使穿着防护衣。

我朝正面看台走去，我哥哥丹波真男和他未来的岳丈站在那儿。看台下4个军士朝竞赛者大声嚷着，让他们更勇猛些，要像武藏那样去战斗——不仁慈、不宽恕、不退却。

真男和佐太上校都穿着紧身短上衣，佩带着闪闪发光的勋章和绶带，每人斜挎着一把弯曲状的军刀，我禁不住地把他们做了个比较。

我哥哥是高个，肌肉健美发达，动作漂亮、优雅。他还是一位十分清秀的美男子，方下巴，那张脸似乎是黄色象牙雕刻成的。

佐太上校看起来肥胖、大腹便便。此地已多年不需他亲自“督战”了。他任职于“帝国总参谋部”，但我从不知他究竟干什么工作，为什么他有那么大权势。他希望真男与他唯一的女儿结婚。她是一位美丽的、颇富天份的年青女子，名叫道木。

冲刺。拚杀。

竹棍击打着对方的胸部、胳膊以及芦苇头盔。一个看起来很衰弱的年轻人被个彪形大汉一棍打倒在地，他畏缩地跪

着、哭起来。

我看到真男走下看台，阻止竞赛者争斗，他来到那位跪着的年轻人面前。

“你不要伤心。”

“我，先生，我有病——”我相信他。他看起来像是患有肺结核。

真男迅速给了他两脚，将他的长筒靴踢入男孩的瘦弱的肋骨。“站起来，”他说，“双手举着竹棍，开始绕场地跑20圈。”

男孩对真男深感惊异，他不知道这位长官的态度怎么突然像是换了一个人，这人正站在那注视着他。

“战争”，真男向士兵们说，“淘汰弱者，强者才能够生存。当你们到了中国就会知道了。士兵们，继续操练。”

真男走到格斗者中间，他的表情变得和蔼可亲。他们的——也是他的——一切都是一种神圣的奉献。

我站在看台一边，试图捕捉佐太上校的目光。他见过我几次，当时真男和他的未婚妻，以及他们家人在一起互相开玩笑，谈论如何使夫妇和谐共处。依我哥哥和道木的情形看，他们的结合是必然趋势。虽然我们家庭的社会地位要比佐太家低得多，实际上，佐太上校代表一种势力，是个阴险的藏有重要秘密的人。作为有权势的军界官员，他亲自左右监察着我哥哥的一言一行。

上校注意到了我，于是我向他鞠躬。

“啊，在这里见到你感到很突然，想参军？”他勉强地笑着问我。

“不，先生，我是想来告诉真男一个好消息。”

“好，好的，”他冷淡地应道。

作为学者，我于佐太上校作用不大。他纯粹是个军人，一个“帝国方面”的追随者。无论军界中过激分子怎样评论，他们都差不多。征服、统治亚洲——为什么不是世界？——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打着天皇的旗号，如果足立教授说得不错的话，天皇从未符合过这种意图。因而，也不奇怪何以佐太上校认为我对他一无用处。

真男又在对士兵讲演，声音既温柔又洪亮。“我们是太阳的儿女，我们为天皇陛下作战，活着的上帝会以仁慈与慷慨来统治我们。不久你们将在中国，你们要献出生命，要勇敢作战，不要退却，永不投降。”

突然，我哥哥脱下短外套，取下军刀，拾起根竹棍，走近一位高大的士兵，此人在操练格斗中已表现出是最好的剑道战士。

“你，”真男说，“你和我格斗。”

我抑制着，结果还是疑虑地对佐太说，“真男没戴头盔，没穿防护衣，他怎么能——”

“不必担心。”

军士官命令新兵返回，此时真男和大个男兵已摆好架势，他们两腿分开，伸着胳膊。我看着哥哥的面孔，那上边有一双混合着机敏与疯狂的眼睛——武藏的眼睛——我心里不停地暗自惊异，我们兄弟是怎样的不同啊。

这是一种全新的训练方法。真男不仅避开了击剑能手的攻击，而且还在与对手作战的同时，讲解了武藏的战术和他的哲学思想。

“要使太阳在我的背后，我就调动对手，”真男说。

“我的右边忙于使用武器，后方则无障碍，因此，我就让对手到我的左边……”

正当他作短刺并要佯攻时，他被新兵刺中，这个新兵不但勇猛，而且技术娴熟。

“第一种方法，进攻，要镇静，迅速移动。”真男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在大个男兵面前挥舞棍棒，使他透不过气、困惑不解。但他屏住呼吸，对着真男腿部猛地一击。真男没有退缩，他重新进攻。“敌人虽然进攻了，但他阵脚混乱，精神已崩溃。我是鹰，他是鸭鸡——”

真男闪电般地移动着，紧握竹棍猛击大个膝部，然后察看他的移动方向，挥动竹棍击中对方脊背下部，新兵脸朝前仆地倒下。格斗已接近尾声，大部分时间我哥哥都在发表演讲。

被打晕了的新兵站起来向真男鞠躬，表现出他被击败后仍保有荣誉观念。真男回敬了他，并说他战斗得很出色。然后命令部队解散。

真男这时看见了我，他走近看台，我们笑着相互鞠躬。在美国，我有握手或拥抱朋友的习惯，但在东京的家里，通常都得抑制自己，因为感情冲动地当着公众拥抱被认为是令人作呕的。

“哥哥，我有个好消息。”

“你得了奖学金？”真男问，他系上外套扣子。

“是的，教育部已同意。这些钱包括路费、学费和住宿费。我在这最多只能呆几个星期了，一定要保证赶上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夏季开学的时间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是以不同方式为天皇陛下效劳的。”真男

说。

佐太插话，“你学什么专业？”

“政治学，主要是研究美国的政治体制。”

“这知识也许对我们有用，”佐太说。

“是啊，建司实际上是美国人，”真男说，“他在俄勒冈呆过两年，说的英语活像美国人，他喜欢美国食品。作为在美国生长和受教育的第二代日本移民，他是合格的。对吗，建司？”

假如我哥哥在提到出生于美国的日本人时，包涵有一种嘲笑和不满，那我真不想理睬，但他似乎又很欣赏我所取得的成就，我感到很窘迫。

“告诉我，”佐太说，“美国人对我们如何？他们怎样对待在那里定居的日本人？”

“在那里许多美籍日本人待遇并不好。不过，这里存有一些偏见，问题很复杂。”

“我曾遇到过一些美国军官，”佐太说，“他们羞辱我们，称我们是黄种猿，是混血人种。这是西方人要恶意中伤我们的阴谋——像‘国际联盟’的报告里就指称我们在南京的行动是暴行。”

我很清楚佐太上校不会在辩论中树敌，特别是现在他是我哥哥的岳丈的情况下。我们朝军营走去，从那不结实的、满是灰尘覆盖的新兵帐篷里传来叫喊声。

“冷饭少爷，”当我们走进一座大楼时，真男对我说，“走，和我们一起洗澡。”

身置于这个军营中，我还感到满意。但我承认我从来就不属于它的一部分。我们穿过门厅走进去。

“冷饭少爷，”佐太重复地说道，“年纪小的孩子，总是最后吃饭，所以总吃凉米饭。”

我笑了，“先生，你说得不错。但在我的记忆中，比我小的妹妹百合子和小弟三郎不知为什么总是吃在我前面。”

佐太觉得这一切很有趣，“真有意思，冷饭少爷。”

我们坐在木凳上擦肥皂，修面刮须，然后浸泡在热汽浴缸里。这会儿，我们躺在按摩板上，女按摩师可爱的手拍打和按摩我们的肌肉。我虽身在军营浴室中，但我哥哥和上校此时却似乎忘记了我。在那一切之后，我成了一个局外人。

“我们不久就要出发了，”佐太上校说。

“怎么这么快？”真男问。

“哦，几个月内，也许到年底。山本上将已停止飞行，他把飞机捐赠给了总参谋部。这是大胆而策略的一招。”

女按摩师弯曲真男的长腿，关节处发出似乎要断裂的声音。真男咕哝道：“他们对此有什么反应？”

“通常的反应是感到奇怪。山本需要有点勇气。他是个天才，但也是个怯懦的人。他有个英明的战略，但他恐怕这会是一场持久战。”

我听着感到十分迷惑。他们所谈的事我从未真正想过。尤其使我困惑的是，我哥哥和佐太两人曾参加过1936年2月26日的兵变。这次兵变事件是那场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仅仅是在5年前，一部分年青军官反对他们的领导人，他们证明说，他们的领导人已被察觉是日本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险分子。这些年青军官发表宣言，声称要惩治那些包围君权王位的恶人。要将天皇从他的险恶的“顾问”中拯救出来。这次行动有140个军官和其他一些人

参加，他们暗杀了许多内阁大臣、高级官员连同他们的家眷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甚至谈论过要废除天皇本人。这次兵变后来被镇压，15名军官被判处死刑，80人被囚禁。但大多数人还是予以自由并允许返回部队。

因为佐太总是做幕后工作，所以从未被控告过。而我哥哥当时只是个军校学员，因此同其他许多人一起被赦免。这些军官的真正企图是要制造一种对抗局面，与苏联、美国、英国、荷兰等其他想阻止日本统治亚洲的欧洲国家宣战。我哥哥参与了这件事，然而，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谴责他。要指责批评一群什么人或什么运动是比较容易的，但要对自己的哥哥，你家中的长兄，一个你青年时期一直敬慕的人提出批评却并不容易。某种程度上讲，对他，你只能一如既往。

洗澡后我与真男在军营门口道别，“你希望我送你什么结婚礼物？”我问他。

“冷饭少爷，”他温和地说，“永远面向乐观，那么任何礼物都会是珍贵的。但什么是最好的礼物？是为天皇服务。你所掌握的有关敌人的知识将是——”

“敌人，谁？我们正在中国打仗呀。”

“哦，建司，我们有许多敌人。”

“不过我还是必须送你一个礼物，真男。”

“请为我祈祷吧，不久我将同我的部队从中国凯旋，我们将是胜利者。然后再去作战——无论天皇指向哪里。”

我踌躇了片刻，“我听说他是主张和平的，他反对在满洲和中国的战争。”

“这是那些叛徒的谎言，建司，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的原因。”

没有论据我说不出更多的东西。但是难道天皇的神圣就是导致军队兵变，军官被杀，甚至要杀皇子？有时根据逻辑是说不通的，谎言成了事实。

我和真男相互鞠躬。我们将在他的婚礼上再次见面。我祝他实现千万个美好的愿望，并祈祷所有八百万众神赐福并保佑他。

丹波百合子：

1941年6月

我哥哥和他的新娘佐太道木，在东京宗教中心上野公园的神道教寺庙里举行了婚礼，结婚这天天气很热，而且刮风。

上野公园是我常喜欢去的地方。轻柔的草坪、花园、宝石般的灯笼以及博物馆都显得非常可爱。在人流拥挤的周末和假日里，在这度过会有一种平和、宁静的感觉。并不是我在乎拥挤，事实上，比起失去正在“流浪”中的可爱的同胞，日本人从未感到过幸福。

道木和真男的婚礼仪式很短而且相当沉闷，我认为就是这样。神道教教父发表了神圣的宗教“演说”，用的是一种老式的宫廷语调。新婚夫妇在名册本上签了字，然后呷了九口传统米酒。众人簇拥着他们俩拉在一起。

我今年整20岁，比真男、建司都小，比我弟弟三郎大6岁。人们都说我是理想的年轻的日本小姐。我穿着栗色、黄色相间的和服，系着金黑色的宽腰带，梳着旧式发型且佩有一串珍珠。不是谦虚，我并不认为我很漂亮。

“6月不是结婚的最好日子，”我哥哥建司对我说，“不过，我希望他们幸福。”

“他们没有选择余地”我告诉他。“真男已决定不久就

返回中国。”

“为什么在10月或11月结婚就最好呢？”建司问。他总爱这样考我，对我进行测验。

“因为正是收获的季节，炎热的夏季已逝去。”

“说得对，小百合子。”

新婚夫妇看起来令人炫目！真男穿着一套蓝色军礼服，戴着他的全部作战勋章和绶带。他的长刀静静地斜靠在他腿上。他的确英俊、漂亮。像建司一样，他也有一张略长的、坚毅的面孔，但真男并不像建司那样容易笑。

佐太道木穿着她祖母的古式白绵缎和服，和服是由优质丝织成的，做工精细。她头戴白色宽边硬丝帽——“藏起女性猜忌的触角”——其真正含义是，如果丈夫去别的女人那里，做妻子的不应生气或嫉妒。

新式婚礼正在进行中，人们相互鞠躬，彼此赠言。我、建司和三郎站在这里，共祝新婚夫妇美满、幸福。我注意到佐太上校这位鳏夫，站在一群高级军官中，背朝其他人正在高谈阔论，颇令人作呕。我的父母，涩谷区的丹波合路先生和太太，和那群身上挂满勋章，现在重又向新婚夫妇致意的军官们相比，看起来很普通。

我父亲与帝国宫廷的一些人站在一起，他地位低下，在宫廷中担任总管职务——负责照管宫内衣物、刀叉餐具和家具，招待来客茶点。我认为这份工作地位不高，但事实上，这工作与宫廷有直接联系，我父亲常可见到陛下，这使他的工作性质远远高于一般管家的职务。

我父亲还是个“绅士”。大多数日本男人在家都很专制，但我不记得父亲什么时候发过脾气或高声讲话。他愿意

待在家里为家人服务，而自己则无什么要求和自私的打算。

我母亲尚木，就日本妇女来说，她的个子算是相当高了，身材苗条，体态优雅，皮肤白皙，略长的脸型像我三个兄弟，而我则继承了我父亲的浑圆而呈玫瑰色的面容。我母亲平时总穿一套朴素的灰白色家用和服，今天因穿着一件“传家宝”——一套蓝绿淡紫相间的、有100年历史的和服，而显得光彩照人。

三郎14岁，爱逗弄，现在正使劲拽我的和服腰带想引起我的注意。当我回头看他要干什么时，他却对我作了个鬼脸，一溜烟跑了。作为家中排行老小，他在各种淘气捣蛋方面都居先行地位，但他不是个坏孩子。他拿根皮棍当竹棍射着玩。他身穿铜钮扣的蓝黑色学生制服，头戴多角学生帽。

我的三个兄弟好像在玩生活游戏。真男自然是家中王子。老大长子总是如此。他将继承父亲的名字和财产。真男自信他从没有过错，并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。作为一个聪明的学生，他获得过军事学院的奖学金，建司也一样，几年之后，变成东京帝国大学的政府部门的学者。所不同的是，真男常受表扬，被宠爱，他的路是别人给规定好的。三郎还有待选择自己的路。但是老二建司，既漂亮又精明、洒脱，却又不知为什么不受父母重视。但他从不抱怨。他努力钻研、学习，获得奖学金；他广交朋友，学说英语、法语，最终“幸运”地接受了“学者命运”。他已在美国度过两年，不久将去“加利福尼亚”攻读博士学位。我真羡慕他即将开始的旅行。

三郎这会正使劲拉建司的茄克衫，并叫着“萤火虫”！

建司笑了。这是三郎的一种独特的游戏方法，他着意要

将真男——戴着全部勋章及军刀——与当学生的建司作一对照。可怜的学生们过着传奇般的学习生活，他们要想用功学习就得抓萤火虫，把萤火虫放进瓶罐里，靠这些小虫发出的亮光来照明，一直学习到深夜。学习刻苦的学生通常被授予“萤火虫”奖章，别在西服翻领上，鼓励他们的学习精神。建司被同学或家里人称作“萤火虫”并不奇怪。

有时我认为建司太拘谨、洁身自好了。我真希望他揪揪三郎的耳朵，或是加入我父亲与宫廷朋友们的谈话中，或者至少与佐太上校说几句话。但他那么优雅、文静，真不忍心去打扰他，他依旧笑盈盈地与我和我的朋友们呆在一起。作为一个男性，建司不是典型的日本人。

丹波建司：

1941年6月

漫无边际的散乱地回忆着真男的婚礼……

百合子真像一块美丽的宝石。她使这里的所有女性，包括她的朋友，还有新娘佐太道木都黯淡无光。当然，新娘也很美，但看起来属于逆来顺受的那种类型。

这里有位政治人物郎泰金吾，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兄。他大肚皮，新剃了头，总爱使一个单片眼镜。他来自东京西部，是国会代表。郎泰参与了一项商界冒险业，被授予安排有关人员接头联系的代理权。他有一张日本人称作的宽阔脸膛——一张有影响力的、充满野心的不太体面的脸膛。混在佐太上校和那些军界客人中，他仅仅只是个平民百姓。

神道教祭祠登上讲台，为我们的天皇作了一番祈祷和祝酒辞：“为天国的儿子，我们活着的、神圣而崇高的上帝祝福。我们要永远将生命和灵魂献给他，我们祝福新婚夫妇白

头偕老，生活幸福，并终身为天皇陛下效劳。”

我们举起米酒杯。真男道木相互鞠躬敬酒。其他人也都互敬米酒。之后佐太上校登上演讲台，“这场婚姻使丹波、佐太两家关系更为密切，我们要共同为神圣的天皇服务。”他宣讲道，“我的女儿道木，要好好服侍真男，为他多生儿子。因为像真男这样勇敢的将士预示着日本的未来。”佐太举起酒杯，“为日本和我们神圣的统治者干杯，为日本——世界强国干杯！”

在楼阁边的草坪上，站着婚礼来宾中仅有的一对白人夫妇。他们40岁时都成为内科医生。亚当·瓦纳姆医生是美国人，他妻子科拉·瓦纳姆医生是瑞士人。他们是公谊会教徒。他们做我们的涩谷区邻居的时间，从他们最早开诊所时算起，已有20多年了。他们救过我妹妹和弟弟，给我和真男治过麻疹、踝关节扭伤、初乳以及其他小孩通常易患的病损损伤。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他们。他们不像日本人那样结交朋友，这似乎并没给他们带来麻烦。作为医学界的教会会员，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人们承认、能满足他人，他们认为活着就是为他人服务。这对夫妇没要小孩，因为小孩有时太恼人。他们善良、仁慈，人们总能在他们那粉刷着白色涂料的诊所外，看见玩耍的小孩。

“多美的一天，”科拉·瓦纳姆对我说。她是个小巧玲珑，富有吸引力的女人，一张圆脸、一头有光泽的褐色头发剪成已过时的，带有些卖弄味的刘海的短发。“真男好英俊，我也没想到新娘这么可爱。”

“也许是一个武士受到的最好奖赏，”我说。

亚当·瓦纳姆过来轻轻碰了碰我胳膊，“奖学金用来作